

商人与儒学

——以明清甬商、徽商、晋商为例

张实龙

(浙江万里学院 文化与传播学院, 浙江 宁波 315100)

摘要:以明清甬商、徽商、晋商为例,分析商人与儒学的关系。三地儒学各有特性:浙东学术张扬人的主体精神,强调经世致用;朱子之学强调“理”与“礼”,主张于书本求索;傅山之学强调“因时取济”,博杂而无所统系。三地商人对待儒学态度不同:甬商对浙东学术不即不离,徽商对朱子之学过于沉迷,晋商对傅山之学过于疏远。三地儒学对商人影响有别:浙东学术影响甬商是隐性的,朱子之学影响徽商是显性的,傅山之学影响晋商是微弱的。

关键词:商人;儒学;甬商;徽商;晋商

中图分类号: F0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09)06-0023-05

常有成功的商界人士作自我介绍,说事业成功如何得益于《论语》或《周易》。社会舆论似乎也在祈望现代儒商的涌现。这些都在说明:考量商人与儒学的关系是颇有价值的事。选择明清甬商、徽商、晋商来探讨商人与儒学的关系非常适宜。明清时期的商业活动已成历史,相关文献足以保证分析的客观性。明清甬商、徽商、晋商与儒学的关系代表三种类型,他们历史遭遇各不相同,正适合作为分析的文本。

一、三地儒学的特性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明清时期宁波、徽州、山西三地有哪些儒学及各具怎样特性。明清宁波主要有姚江心学和浙东史学,其代表人物是王阳明和黄梨洲。浙东学术第一是张扬人的主体精神。阳明“良知”说认为,人心天生具有感知、觉解和主宰的能力。人对事物有感觉,如果某物不在感觉之内,那么它对于人也就没有价值,所以阳明说“无心外之物”。人对事物感觉或“好”或“恶”,也就对事物作出了善恶判断,并对此善恶的内在条理有所觉解。因此,阳明说“无心外之理”。与此同时,“身之主宰便是心”,引导人趋善避恶。阳明主张以自心为主,不惧外在权威,“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1](74)}浙东学术第二是强调经世致用。阳明提倡“知行合一”,要求人有自觉性,不能只是懵懵懂懂做事,对事物之理浑然不觉;有实践性,不能只是想想了事,还要亲身实践。梨洲继承并发展了阳明心学,将“知行合一”转成经世致用。他认为学者不光要“穷经”,还要“读史”,然后才能经世。他还说:“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2](序)}

徽州儒学大约经历三个发展阶段:自南宋至明中期,朱子学大兴;明中后期,阳明心学渐占上风;清以后,乾、嘉朴学兴起。^[3]对徽州社会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朱子学。朱子学第一是突出“理”。朱子之“理”既是“所以然之故”,又是“所当然之则”,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先天地而有。因此,人应该时时处处体会“天理”,循“理”而行。与“理”相配套,朱子还重视“礼”。《朱子家礼》对家庭生活和人生成长各方面做出具体规定。朱子学第二是提倡读书。人通过读书明白事理,然后运用于人生实践,才不会出现差错。他主张“先知而后行”。

收稿日期:2009-05-18

作者简介:张实龙(1964-),男,安徽安庆人,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明清时期山西儒学代表人物是傅山。傅山之学第一是讲究实用。他反对程朱理学空疏无用,也反对阳明心学流于放荡。他认为,学问之事在于追求实用,不注重实际的学问,等于糟粕一类。傅山之学第二是博杂。为求实用,几乎所有学问都可为我所用。傅山首开清代子学研究,对《老子》《庄子》《管子》《公孙龙子》《墨子》等用力尤勤。他常引佛、道学理来印证己说,在音韵、训诂、诗文、书画、金石、医学等方面也颇有造诣。

总之,浙东学术张扬人的主体精神,提倡一切以自心作主,对于冲破当时的程朱理学束缚,具有解放思想的功效,其末流流于放荡无忌。朱子之学重在维系人间的秩序,抬出客观外在之“理”与“礼”,使人有规矩可循,其弊是造成对人性挤压。傅山之学讲适时实用,与浙东学术经世致用有相通之处,但博杂无所统系。

二、三地商人对儒学的态度

儒学本是文人之事,与商人发生关联,主要依靠民俗作为中介。三地儒学各有特性,一定程度是受当地民俗制约。反过来,儒学也会对当地民俗施加影响。商人出门经商,他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无不打上家乡习俗的烙印,习俗还左右着商人对待学术及学者的态度。一个地方的儒学、风俗和商帮文化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

明清甬商对浙东学术的态度是不即不离。一方面,此时的宁波商人如方介堂、叶澄衷、朱葆三、虞洽卿等人,多出身穷人家,被生活所逼离开宁波到外地当学徒做生意。他们文化水平不高,不可能有意识去亲近儒学,所以说“不即”。但是另一方面,明清时期宁波文风兴盛,自小生长于宁波的商人,免不了受其熏染,所以说“不离”。

明清时期宁波讲学之风盛行。阳明和梨洲都重视讲学。邹守益《阳明先生文录序》说:“当时有称先师者曰:‘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气节,或以勋烈,而公则兼之。独除却讲学一节,即全人矣。’先师笑曰:‘某愿从事讲学一节,尽除却四者,亦无愧全人。’”^{[1](1569)}无论是流放边鄙之地,还是戎马倥偬之间,阳明皆以讲学为人生最大乐趣。宁波是阳明讲学的重镇,据《明儒学案》其浙东弟子有姓名可查者超过三十人。梨洲在反清复明无望之后,大部分时间也是讲学,“东之鄞,西之海宁,皆请主讲,大江南北从者骈集,守令亦或与会”。^[4]

阳明、梨洲的讲学,影响着当地民俗,也影响着当时商人。《明儒学案》于阳明弟子王爨名下,附有樵夫朱恕、陶匠韩乐吾、田夫夏叟三人传记。其中说到韩乐吾,“以化俗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秋成农隙,则聚徒谈学,一村毕,又之一村”。^{[2](841)}描述的是王学在泰州的情形,但宁波的情况可以类推。当时阳明、梨洲学说流行于民间,对来自民间的甬商自然产生影响。镇海庄士英即是明证。他在南洋做生意致富后,回到故里庄市造楼房,门额题曰“止所”。

明清时期徽商对朱子之学的态度近乎痴迷。徽州大家族多是源于中原的书香之门或官宦之家,南迁到与外界相对隔绝的徽州,不仅保持着大家族的生活方式,还坚守着依靠读书取仕来光大门楣的价值理念。因此,徽州的读书风气一直很好,“婺人喜读书,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5](41)}自朱子回到故里讲学以后,朱子之学便在徽州发扬光大,并逐渐形成笃信朱子学的新安理学学派。后来朱子之书被官方指定为科举考试的教材,徽州人以有朱子这样的乡贤而感到自豪,对朱子崇拜达到无以复加地步。“凡六经传注,诸子百氏之书,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6]有些家族,“乃推本紫阳家礼,而新其名曰家典”。^{[7](403)}在“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5](38)}习俗的影响下,徽商“虽为贾者,咸近士风”。^{[5](438)}

徽商痴迷于朱子之学具体表征有:第一,经商时保持着读书的习惯。明代休宁人江遂志行贾四方,“虽舟车道路,恒一卷自随,以周览古今贤不肖治理乱兴亡之迹”。^{[5](71)}第二,经商中践履着儒家之道。明休宁人汪坦,“虽托游于货利之场,然非义弗取。其遇物也咸率其直而济之以文雅,此其商而儒者与”!^{[5](445)}第三,获利后资助文人及文化事业。明清徽商在捐资书院学校、资助穷困文人、印刷学术著作、举办讲会、购买典籍等方面,一掷千金,毫不吝惜。

明清时期晋商对傅山之学的态度有些冷淡。生活于黄土地上的山西人，生活质朴，崇尚实在。自明代晋商迅速崛起后，山西形成重利轻名的风气。《潞志拾遗》感叹当地风俗：“人见半两五铢神通足恃，故日夜惟利是营，而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甚者子不顺父，亲在而别藉分财，弟不从兄，同室而藏怒蓄怨。……此又时势之大可扼腕，大可寒心者。”^{[8] (174)}刘大鹏《退想斋日记》说：“近十年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香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至有既游庠序，竟弃儒道而就商者，亦谓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之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9] (77)}因为重利而轻名，晋商就不会太重视读书。晋商后代自揭家底说：“说晋商是‘学而优则商’，可能是不确切的。以我家为例，‘新道街本家’基本上不念书，东家是‘白丁’，可以想见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见识。渠源潮只粗通文字，桌子经常摆着的是一本‘杂字簿’，可见文化程度很低。我曾祖父渠源浈可能读过四书五经，‘少学举子业’，但也仅此而已，谈不上‘学而优’。……（山西）没有一个票号东家是‘学而优则商’的，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中过进士，甚至连举人都不是。”^{[9] (489)}当然也有例外的，榆次常家是晋商中注重家塾教育的典型。山西人即便是读书，也只是关心书信往来、商业运算等实用知识。张四维说其弟张四数：“尤精《九章算术》，凡方田粟布勾股商分等法，……弟皆按籍妙解，不由师授。”^{[10] (162)}榆次常家十三世常立教对子弟说：“方今以帖括取士，因不能不事举业，然为若辈计，究宜以有用之学为亟。”^{[9] (342)}山西如此风俗，可以解释这样一件事：象傅山那样有名的学者，为何不能如朱晦庵、王阳明、黄梨洲那样受邀讲学，而是靠行医卖药维持生计。可以说：傅山之学对晋商影响不大。

三、儒学对商人的影响

甬商、徽商、晋商所接触的儒学不同，对儒学的态度有异，影响到他们的商业行为。浙东学术对甬商的影响多是隐性的。浙东学术强调人的主体性，甬商在经商中很好地诠释了人的主体性。甬商的主体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社会转型期能主动求变。当大量外国商品倾销到中国、大量外国资本抢占中国市场的时候，甬商并没有象徽商、晋商那样固守传统行业，而是主动进军新型产业，成立中国人自己的银行，将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起来，与外国商人争锋。在外国资本势力的冲击下，曾盛极一时的徽商、晋商渐次式微，而甬商却成功地实现了近代转型，明显是得力于这种主动求变的心力。二是在与政治势力接触时能力争主动。在参与洋务运动时，甬商利用自己洋行买办的身份，居于洋人与清政府之间获利，他们的经营是主动的。在支持辛亥革命时，甬商出钱出力，出谋划策，他们不是要在政治斗争中谋得厚利，而是为了展示自身的力量。联想到徽商、晋商对明清政府的依附和对辛亥革命的漠视，我们更能感受到甬商政治上的主动性。三是在经营管理上能制度创新。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鲍咸昌重视职工福利，实行花红、退俸金、子女教育扶助金、星期休业、女工产假等制度。印刷厂内每年职工有事假20天，年终照发工资。这些制度在中国传统行业里闻所未闻，实是“良知”发用之结果。当然，人的主体精神发挥过头就是师心自用，有些甬商也有这样毛病。例如余姚人黄楚九曾是名噪一时的大资本家，他涉足制药、游乐、金融、房产等多个产业，经营范围广泛，财力分散，组织庞杂，最后只能虚撑场面。他的企业在内外交困中入不付出，他本人也含恨而死。^[11]

浙东学术提倡经世致用，甬商在经营中发挥了实用主义精神。在清代，一般中国人心理上不敢做买办：外国人用枪炮打开中国大门，与洋鬼子打交道是一种危险举动；做洋行买办就是将灵魂出卖给洋人，是数典忘祖。甬商没有如此顾忌，他们看到广东人做买办赚大钱，也争先恐后去做买办。甬商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大力兴办火柴厂、化工厂、轮船运输、娱乐服务等新型产业。凡外国人有的，甬商都采用“拿来主义”，引进外国先进机器，招聘外国技术人员，学习外国先进制度，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创办中国民族工业。

朱子之学对徽商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第一，朱子之学强调“理”与“礼”，突出外在权威对人的规范，这对徽商奢侈性消费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初，扬州盐务，竞尚奢丽。……时争奇斗异，不可

胜纪。自诚一来扬,以俭相戒,值郑鉴元好程朱性理之学,互相倡率,而侈靡之风,至是大变”。^{[51] (363)}第二,徽商读朱子之书出于个人爱好,反而得朱子学真精神。如明末徽人张光祖弃儒经商,“时或值大利害事,每引经义自断,受益于圣贤心法最多”。^{[71] (39)}不是根据实际情况依靠自心作主,而是“引经义自断”,从圣贤那儿寻求理论支持,走的正是朱熹求理于书本之路。第三,朱子之学影响着徽商的政治态度。徽商毕竟是读朱子之书的,他们虽然依附于官府,但多是凭学识去接触官员。如黄存芳,“虽为贾人,而言论风旨雅有士人标格,故缙绅辈乐与之交”。^{[51] (112)}对官场黑暗,徽商敢于斗争。如明末“九江关蠹李光宇等把持关务,盐舟纳料多方勒索”,徽商江南能“毅然叩关陈其积弊,奸蠹伏诛,而舟行者始无淹滞之患”。^{[51] (410)}朱子之学重视正统观念,徽商始终站在朝廷的一边。一方面他们捐输大量钱财,佐解国家之急需;另一方面他们极力反对政府之敌人,如抗击倭贼、参与镇压平民起义、反抗入关满人等。第四,徽商沉迷于朱子之学,有时反而模糊了自我商人角色。歙商黄蛟峰,“生平著述有《读易抄》三卷,《尚书备忘》十二卷,《春秋传略》二卷,《四书备忘》十四卷,《性理便览》十八卷,《史鉴会要》六十四卷,《通鉴外纪》五卷,《蛟峰文集》四卷,皆经世实学,非剽窃鉅釘者比”。^{[51] (477)}看黄蛟峰的著作,多与朱子学相关,著述如此丰富,很难断定他是商人还是儒者。第五,朱子之学叫人体察“天理”,“天理”与“人欲”不可调和,无形中抑制了徽商对利润的追求。徽商经营领域基本不出盐、茶、木、典等传统行业,经营地域基本不出江浙、长江一线。有些徽商出门经商原是生活所逼,赚取一定钱财后就退出商业。如明初的黄敬宗,“幼读场屋书”,后不得已“挟赀南走荆湘,北游淮甸”,不几年赚取十万贯。以他此时所积攒的资本和所积累的人脉,本可以将自己的事业做大做强,但是他却“遂归之,志不再出”,将所赚钱财用于建房“计三百余楹”,^{[51] (438-439)}过上了封建大家庭的生活。

傅山之学对晋商影响微弱,但两者毕竟都受山西民俗的熏陶,从傅山之学角度可以看晋商的特质。傅山之学强调实用,晋商崇尚金钱。过于崇尚实用,对文化自然有所排斥。有资料显示,明代晋商文化层次较高,如明河曲商人常怀礼,“始而业儒,孝友成性;继而服贾,信义孚人”。^{[91] (310)}明张士毅,“舍儒就商,用儒意以能积贮之理,不屑纤细,惟择人委任,货计出入”。^{[91] (311)}但到了清代,晋商的这类资料少之又少。晋商的这种变化,与其在明代的成功有关。既然经商可以挣钱,也就用不着读书,山西人养成了重商轻士的风气。晋商向以重信讲义出名,有学者误以为这是受儒家文化影响,其实晋商的信义是在金钱上落脚。为了大家都能赚钱,必须将各自的权利义务规定清楚。晋商重信讲义,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沈孝思说晋商“祖父或以子母息丐贷于人而道亡,贷者业舍之数十年矣,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贷,则他有大居积者,争欲得斯人以为伙计,谓其不忘死,焉肯忘生也?则斯人输少息于前,而获大利于后”。^{[81] (116)}谁违背道义,就是触犯众怒,不能再获钱财。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崔崇圩剖腹举动:他“一岁折阅十余金,其主人有怨言,崔崇圩以刃自剖其腹,肠出数寸,气垂绝,曰:吾拙于贸易致亏主人资,我实有愧,故不欲生”。^{[101] (125)}晋商的金钱观还表现在他们的政治态度上。明清之交,晋商身为明朝人,竟然与满人军队做生意,为满人军队提供情报。只要能赚钱,可以不顾民族大义。傅山是讲民族气节的,由此可以看出,晋商受傅山之学影响微弱。接近官员时,晋商多以钱财开路。晋商票号能够兴盛,主要是与贪官污吏相勾结所致。祁县老商人杨某说:“与其说票号的股东是山西富商大贾,还不如说是清政府及其显宦要员更确切些。”^{[81] (82)}晋商崇尚金钱,在具体经营中显得异常精明。晋商王文显,“善心计,识轻重,能与时低昂,以故饶裕。与人交,信义秋霜,能析利于毫末,故人乐取其资斧。又善审势伸缩,故终身弗陷于井罗”。^{[101] (148)}晋商发明的顶身制,“资本家出钱,劳动者出力,均有股份,一经获利,平等分配,是以经理伙友,莫不殚心竭力,视营业盛衰,为切己之利害”。^[12]可以说,这是在商业经营中将金钱的效用发挥到极致。

傅山之学注重实用,博杂而无所统系。同样,晋商崇尚金钱,精神上无据。没有金钱时,晋商拼命挣钱,演义出许多艰苦奋斗的佳话。有了金钱以后,晋商精神上无着落,他们注重一些实在的

东西：置土地，造宅院，吸鸦片，夸富贵。为显示富有，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太谷曹氏家族传到曹克让时，全家大小每日是山珍海味；男女老少人人吸食鸦片，家中平时存储鸦片万两以上；佣人多达 370 余人，养家兵 500 余人，每年家用开支 10 余万元；每逢婚丧嫁娶，大摆宴席，往往历时一月，花银上万。^{[8] (79)}

四、结语

商人与儒学之间只是间接关系，因此本文尽可能规避必然性的断语。但是我们从明清甬商、徽商、晋商的兴衰陈迹中，还是可以管窥一些征候。就学术而言，浙东学术更适合转型期的社会。它要求人们既自心作主，冲破权威束缚；又经世致用，落在实处。朱子之学强调外在权威，毕竟对人性有所拘束。傅山之学博杂无所统系，理论上到底未能圆融。就商人对儒学态度而言，甬商“不即不离”较符合“中道”。“不即”可以发挥商人自主精神而不受羁绊，“不离”又使精神有所主而不至于坠落。徽商有些“过”，晋商有些“不及”。得出这样的结论，并非出于成王败寇的思维习惯，而是从现代视野中来审视明清时期的商帮文化。

参考文献

- [1] 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2] 黄宗羲. 黄宗羲全集: 第七册[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 [3] 李琳琦. 徽商与徽州的学术思想[J]. 历史档案, 2005 (2): 54-58.
- [4] 全祖望. 全祖望集汇校集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219.
- [5] 张海鹏.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M]. 合肥: 黄山书社, 1985.
- [6] 李琳琦. 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19.
- [7] 张海鹏. 徽商研究[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5.
- [8] 李希曾. 晋商史料与研究[C].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6.
- [9] 穆雯英. 晋商史料研究[C].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1.
- [10] 张正明. 晋商兴衰史[M].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1.
- [11]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宁波帮企业家崛起[C].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166-176.
- [12] 陆国香. 山西票号之今昔[J]. 民族, 1936, 4 (3).

Merchants and Confucianism: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Ningbo merchants, Anhui merchants and Shanxi merchant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ZHANG Shi-long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s, Zhejiang Wanli University, Ningbo 315100,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rchants and Confucianism can be analyzed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the Ningbo merchants, Anhui merchants and Shanxi merchant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onfucianism may find its variations in the three places. The East Zhejiang scholarship accentuates the spirit of human subjectivity, emphasizing the application of what is learned to practice; the scholarship of Zhu Xi attaches much importance to “reason” and “courtesy”, insisting on much erudite learning; the scholarship of Fu Shan lays stress on “learning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appearing more erudite than systematic. Thus the merchants in the three places had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Confucianism respectively: Ningbo merchants kept Confucianism at arm’s length, Anhui merchants indulged in the scholarship of Zhu Xi while Shanxi merchants had the scholarship of Fu Shan estranged from them. Undoubtedly Confucianism had varying influence on the merchants of the three places. The East Zhejiang scholarship had implicit influence on Ningbo merchants; the scholarship of Zhu Xi had explicit influence on Anhui merchants; the scholarship of Fu Shan only had feeble influence upon Shanxi merchants.

Key Words: merchants; Confucianism; Ningbo merchants; Anhui merchants; Shanxi merchants

(责任编辑 李亮伟)